



第6期（总6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召开全院集体学习交流会	4
探索育人实践创新与网络强国建设《北大青年研究》春季号出刊	5
季羨林托孤之作《北大回忆》忆北大校园往事	6
北大国子监大讲堂第104讲：侯仁之与北京学	8
“北大经济国富大讲堂”举行首讲	10
“两岸·亲缘·传承——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讲座成功举办	11
“教授茶座”项目启动 王恩哥校长谈学习与成长	11
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与倡导总裁一行访问北京大学	12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13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协议备忘录正式签署 北大赢得主办权	16

■ 网教之声

互联网思维与教培行业：规则的力量	18
北京大学：以MOOC建设引领国内高等教育改革	23

■ 北大人物

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下)	31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专访叶嘉莹	37

■ 北大学者谈读书

书籍与修养	43
读书与生活	44

■ 好文共赏

费孝通的学术理想	49
梁漱溟：做学问的八层境界	53

■ 史苑钩沉

北大怪人——辜鸿铭	57
老北大课堂轶事录	61

■ 大美北大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65
校景亭	66

■ 学员心声

我的青春追梦故事	68
----------	----

编辑寄语

4月18日到20日，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心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已经走过了15年，一年一度的聚会今年有了新气象。在MOOC的冲击下，网络教育应该如何改革？校外学习如何把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结合起来，成为综合的教育平台？规范管理、加强教育、人文关怀、提高质量是我们提出的方向，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愿意与学习中心各位领导与老师共商共进，共迎挑战。在此做个预告，下一期燕园网讯当中，我们会把会议内容做一详尽的报道。

这一期燕园网讯中选编了和互联网思维与教育培训行业相关的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曾海涛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郑鹞、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曾玉芬、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吴晓风、李文文

新闻动态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召开全院集体学习交流会

4月11日下午一点半，继续教育学院2014年第一次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暨全院教职工集体学习交流会，在燕园大厦1218教室召开。北京大学副教务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关海庭围绕继续教育学院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作了主题讲座。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李胜主持会议，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全院教职工参加了本次学习交流会。

关海庭首先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要求学院抓紧一切时间通过学习提高干部和员工素质，并明确要求按照学院出台的理论学习制度，每学期至少组织三次以上集中学习，每位员工至少参加其中两次集中学习。今年的集中学习活动的首先由院领导班子成员轮流担任主讲。

随后，关海庭从战略概念及其意义、学院发展战略、实现战略的具体措施等三个方面展开了主题讲座。关于战略概念，关海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归纳说明，并结合自身实践和工作经历中的若干实例，强调了战略的重要意义。关于学院发展战略的设想，关海庭提出“在学历

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之上，全力发展高端培训和网络非学历教育，建设功能完备、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继续教育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思路。关于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措施，关海庭强调要实现体制、人才和价值观三要素的统一，其中体制是载体，学院争取在3年之内对现有体制进行适当调整；人才是素质保障，强调要培养具有信仰、意志坚定、乐观、开放、办事得体的优秀人才；价值观是决定人行为的心理基础，其统一的途径主要通过学习来实现。最后，关海庭结合学院当前工作实际，再次强调全体员工要有创新，有思路，有责任心，并要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北大平台不断学习，提升素质，达成共识，推动学院科学发展。

本次学习是继续教育学院全院层面的年度首次集中学习。在2月19日，为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关于加强理论学习的整改要求，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制定了《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理论学习制度》，学院内各支部、各



办公室随即展开了形式多样、理论联系实际的主题党日活动和科室学习交流活
动。今后，学院将继续通过集中学习、
讲座报告等形式，进一步增进了解、促
进交流，不断提高员工综合素质，增强

责任心和使命感，打造一支作风正、素
质好、能力强、团结向上的优质队伍，
为学院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探索育人实践创新与网络强国建设

《北大青年研究》春季号出刊

近日，《北大青年研究》2014年第
1期（总第37期）顺利出刊。本期共13
个专栏，31篇文章，124页，总字数约
17万字。本期杂志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成立这一重要决策背景
下，积极响应中央建设网络强国的发展
战略，探索新形势下高校育人实践的理
念和模式新突破，创新网络育人的新形
式、新方法、新途径，以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目
标，集中推出了一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优秀理论成果。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给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挑战，
在此背景下，杂志刊载了教育部思想政
治工作司冯刚司长题为《关于创新网络
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思考》的指导讲话，
在聚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问题的基
础上，探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所在，
从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角度，提

出了新时期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途径。青年研究中心推出的《人文视
野下网络强国建设的社会历史思考》一
文，则立足于人文主义的视角和思路，
以网络时代国民综合素养的提升为突破
口，提出积极构建促进网络时代健康、
有序、持续发展的责任体系的创新观点。



《北大青年研究》作为学生工作理论探索和工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将继续努力扮演好“理论孵化器”与“实践推进器”的重要角色，探索杂志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积极服务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大局。杂志编辑部也将继续贯彻落实学校领导和杂志编委会制

定的发展战略，拓宽研究视野，增强现实关怀，积极发挥理论研究在破解育人工作现实难题中的基础指导作用，为人才培养作出新的贡献。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季羨林托孤之作《北大回忆》忆北大校园往事

近日，著名作家、电视制作人、北大才女张曼菱女士的新作《北大回忆》由三联书店旗下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刊行，全国各大书店同步发售。

东方学者季羨林的托孤之作

本书缘起于2007年作者与季羨林先生的一次谈话，谈话中，季先生鼓励她像《浮生六记》那样写一本《北大回忆》，回顾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的北大岁月。

翌年夏日，远在西南的张曼菱收到来自季老的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北大回忆”四字，连写两遍。张曼菱被深深打动，“他已为我的未竟之作题词了。此嘱有深意，有如托孤。用他自己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的观点：这是‘后死者’对先死者必须完成的。先生说：‘应该写，值得回忆。’

有他深邃的智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

布衣寒窗的校园往事

北大中文系七七、七八级能人辈出，张曼菱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幸而生于布衣之家，幸而以布衣之父为启蒙之师”。1977年恢复高考，她即在云南考得高分，因为当时还有“政审”关，无奈被复旦大学打了“回票”。第二年，凭借优异的成绩，她再度考场奏凯，高中文科状元。这次政策有了变化，求贤若渴的北大招生老师，把这位才气和脾气都很大的女生，纳入北大帐中。从此，张曼菱开始了风风火火的新人生。

在这部二十几万字的散文集中，张曼菱从初入北大的“燕园春潮”开始回忆，一直写到她最近几年对西南联大历史的追踪。



书中的她敏而好学，热情灵动，颇得老师同学青睐，也因锋芒毕露，招致周遭的冷眼暗箭；她是1980年北大“民主竞选”运动中唯一参与校园人大代表竞选的女生；她在北大求学期间，就在名刊《当代》上发表风行一时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被改编成电影《青春祭》，“听说那位伊文思先生看过了很惊叹”；她是校园“女神”，追求者众，却不屑作“小女生”；毕业以后，争得“专业作家”名头，远赴新疆采风，几乎留下当新娘；为保存西南联大的“活历史”，她遍访名家，深得联大师生信任，却又与某些部门的陈旧观念发生冲突……昔日风云，如今皆聚集为笔下胜景，在《北大回忆》中一一呈现：上课需要如“打仗”一样抢位子，“教室里坐不下了，就敞着门，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蒸雾腾。”沿街叫卖“非正式出版物”，学校交代：“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不要反抗，也别吵架，到那里就静静地等着，学校会来领你们。”

如今已是著名作家、电视制作人的张曼菱女士回首那段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光时，由衷地感受到作为“北大学生”所享有的那份特殊的受保护的自由。“我们得创造一些新鲜的东西来，超前于这

个社会，回报于我们的身份。”也正是由于置身于这一高地，她得以在会上与曹禹辩论；致信李泽厚，上来就谈《美的历程》的不足，“就好像他是我的同学似的”。这些先生也给予她温润的回音、赏识与气度。

那个宽容、温厚、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年代铸造了这一批人，也生动地描画了什么叫作“天下己任”、“兼容并包”以及与之相关的“北大精神”。

北大人常有不羁的思想，也往往对“北大精神”念兹在兹。在以往的“北大回忆”类图书中，这必是重中之重，张曼菱自然也“未能免俗”。在书中，她对“北大精神”的展现，既借助了个人的精彩人生，对得益于和当时北大老师的或深或浅的交往。和当下大学师生关系的常态迥然不同，历史给了张曼菱们与那个特殊的时代中渴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老师们特殊的亲近，亲近得让后来者们羡慕嫉妒恨，而“北大精神”也在这些亲近中，在长者们的风貌、风度、风骨中展现无遗。那些“隔代亲”的名家——朱光潜、林庚、金克木、王力、朱德熙、季羨林等等，在张曼菱笔下自有熠熠风采，从那些被她称作“守望者”的“中青年学者”——卢甲文、闵开德、谢冕、袁良骏、倪其心、周强、

孙玉石、马振芳、金开诚、严家炎、袁行霈——身上，同样可以强烈感受到“精神的魅力”。鼓励学生抛开自己的名作直接阅读外文资料，允许学生去图书馆自学而不必上自己的课，宽容地面对学生对自己观点的质疑，学生受到政治压力时挺身保护自己的“孩子”，像同龄人一样毫无滞碍地平等交流，在日常交

作者简介：

张曼菱，女，汉族。云南昆明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即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时轰动京华，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被誉为中国大陆知青电影的巅峰之作。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

往中自然地“熏染”学生的品格，学生在人生途中需要帮助时无私地伸出温暖的手……

从关于当下大学校园的文字中，或许依然能够零星地看到师生深情，但像张曼菱笔下的种种师生关系景象，那种师长对学生无私的喜爱、期待和推举，似乎很少全面复现了。

主要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小说《唱着来唱着去》；散文集《北大才女》；回忆录《中国布衣》；评论集《张曼菱评点〈红楼梦〉》；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歆琴

北大国子监大讲堂第 104 讲：侯仁之与北京学

2014年3月22日，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市东城区教委联合举办的“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第104讲在东城区国子监中学开讲。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肖东发教授继续作主题为“侯仁之与北京学”的专题讲座。

肖教授延续上次讲座，从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两轴两带多中心”格局讲起，重点讲述了北京的中轴线文化。他指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的风物和文化有着自己特殊的底蕴，表现在政

治和文化的连续性、递升性、辐辏性、包容性、融合性、集大成性上。

接着，肖教授举例讲述了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过程中的得与失。他认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历史名城，在建设世界城市、宜居城市的进程中，唯一正确的原则就是遵循整体保护、积极保护、保护第一的原则，精心设计，适当改善，稳妥地逐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妥善解决好与之密切相关的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为此，肖教授阐述了推进北京发展和管理的五点建议：一是要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二是要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特别是工业项目选择，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有效控制人口规模，增强区域人口均衡分布，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三是要提升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形成适度超前、相互衔接、满足未来需求的功能体系，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以创造历史、追

求艺术的高度负责精神，打造首都建设的精品力作；四是要健全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市政设施运行管理、交通管理、环境管理、应急管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五是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 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最后，肖教授通过播放录像片，带领学员们游览了北京大学校园，并与学员们分享了北京大学许多名师的风采，带领学员走近北大名师的学术和生活，去体会他们的精神和风骨，博得学员们阵阵掌声。

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第 105 讲将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在东城区国子监中学举办，具体讲座信息将通过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网站

<http://www.bjdi.org> 和东城区社区教育网 <http://www.110101.cn> 发布，请有兴趣的朋友们随时关注。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北大经济国富大讲堂”举行首讲

3月28日下午，“北大经济国富大讲堂”第一讲——“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六层学术报告厅举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章政教授主持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北大经济学院兼职教授李扬应邀发表主旨演讲。讲座吸引了200余名师生到场聆听。

章政对李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北大经济国富大讲堂”的缘起与宗旨。“国富大讲堂”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于2014年隆重推出的系列学术讲座，以“国富”二字命名，意在纪念严复先生翻译《国富论》、将现代经济学引入我国并建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的肇创之功。章政指出，“国富”与经济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有很深的渊源。他希望同学们能够充分利用“国富大讲堂”的平台，潜心思考经济学原点的最基础问题，积极探索经济学最前沿的领域。

李扬围绕“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发表演讲。他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和构成要素入手，指出国际货币制度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大国博

弈的主要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决定金融经济，对金融经济的研究离不开对实体经济的剖析。李扬逐步展开，对各类货币制度展开了国别之间的横向比较和古今之间的纵向分析。他指出，金本位的本质是英镑本位，其在经济上并不是“中立”的；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及自身所缺乏的相容性、自洽性是促使其走向消亡的重要原因。他还提醒同学们走出“欧洲中心论”，不要忘记“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思索苏联东欧集团的历史经验与经济影响。

在互动环节，李扬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对观众的提问给予了详细的解答。讲座持续了3个小时，启发大家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使大家了解到当今国际货币制度面临的问题、改革的动向与发展的前景。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两岸·亲缘·传承——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 讲座

成功举办

2014年4月11日下午，作为“我眼看中国”第十三届国际关系学院学生文化节重要活动之一的大师讲座——

“两岸·亲缘·传承——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在正大国际中心弘雅厅顺利举行。讲座邀请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台盟中央副主席汪毅夫作为主讲嘉宾，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陈杰、杨毅周，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原部长卢咸池等出席了讲座。讲座由国际关系学院团委书记高静主持。

汪毅夫通过回顾历史，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华宗法制度与闽台文化、两岸亲缘的关系，为同学们作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报告。他首先简单地回顾了台湾民众“返乡探亲”的历史，由此引出宗法

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接着，他详述了受前辈学者研究启发，自己创设的宗亲图表，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讲座中，汪毅夫解释了闽台文化具有怎样的同质性、闽台文化的认同如何形成、闽台文化为何有强烈的寻根意识等，使在场听众感受到了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的无穷魅力。

演讲结束后，汪毅夫与来自海峡两岸、校内校外的百余名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讲座加深了在座师生对两岸关系及台湾问题的认知和理解。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教授茶座”项目启动 王恩哥校长谈学习与成长

3月25日上午，由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主办的首场“教授茶座”在光华管理学院咖啡厅举行，校长王恩哥院士与通过“燕园学子微助手”微信平台报名

的20位同学讨论学习和成长话题。学生工作部部长张庆东、副部长陈征微等有关老师参加活动。



王恩哥与同学聊天

王恩哥对“教授茶座”项目非常赞成。他表示，学校努力增加老师和同学接触的机会，小班课教学也是这样的尝试，对同学们的成长都是有益的。

活动结束后，王恩哥与同学们合影留念，并和蔼地告诉同学们，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物理学院毕业生题赠的字“高怀见物理，和气得天真”。他还亲

笔给同学们留下了寄语：Life is so beautiful!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与倡导总裁一行访问北京大学

4月8日下午，应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之邀，盖茨基金会全球政策与倡导项目总裁马克·苏斯曼博士一行访问北大，并在“对话世界”系列——青年与公益活动中以“创新慈善 改变世界”为题进行讲演。

活动开始前，北大副校长李岩松会见了马克·苏斯曼博士一行。李岩松首先向客人介绍了北京大学的相关情况，并表达了希望在健康及发展等相关领域与盖茨基金会展开友好合作的意愿。马克·苏斯曼博士对北京大学在全球健康及发展领域的研究和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

对北大为国内外公益组织培养和输送大量人才表示感谢。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介绍了学院情况及非洲研究中心、国际青年发展研究中心情况。

北京论坛秘书长兼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部长严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范士明、北京大学非洲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刘海方、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欧美部部长胡俊等陪同出席了会见。

会见结束后，马克·苏斯曼博士代表盖茨基金会出席“对话世界”系列——青年与公益活动，并以“创新慈善 改变世界”为题发表讲演，演讲会由范士明主

持。马克·苏斯曼博士在讲演中表示，只要各方携手，人类有望在 2035 年消灭健康领域的不平等，中国可以在这场全球努力中发挥独特的领导力。他表示，盖茨基金会希望未来在更多领域与中国携手共同促进全球健康。

本次“对话世界”系列——青年与公益活动由北京大学、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共同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青年发展研究中心承办。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来访北大并发表演讲

3 月 22 日上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女士 (Michelle Obama) 到访北京大学，抵校后前往北大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并与青年学生开展交流活动。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 (Max Baucus) 及其夫人，外交学会副会长陈乃清及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张艳玲陪同到访。

上午 10 点 30 分，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校长王恩哥、副校长

李岩松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会见了来宾。在会谈中，朱善璐主任、王恩哥校长对米歇尔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她介绍了北京大学即将启动的“燕京学堂”计划。“燕京学堂”计划倡导从跨学科的背景出发，聚集国际化的顶尖师资和一流学生，力求在全球语境下深化对中国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校领导还高度赞赏米歇尔对推进“十万强计划” (100,000 Strong Initiative)

的实施、支持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所做的积极努力。



朱善璐主任、王恩哥校长对米歇尔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上午 11 点，演讲会正式开始。王恩哥校长、鲍卡斯大使先后发表致辞。王恩哥在致辞中称赞米歇尔是一位教育发展和国际交流事业的杰出推动者，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为青年教育和跨文化交流注入力量。他指出，北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流大学一样，认识到当前的时代正面临诸多挑战，而高等教育的关键使命，正在于造就一批视野广阔、兼具创造性和批判思维、具备全球合作能力的青年人才，他们将肩负起推动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任。为此，北大正在通过实施“燕京学堂”等有力举措，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营造国际化的育人环境，深化青年学生

之间的文化理解，以最终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进步。他也向米歇尔发出邀请，希望她的两位女儿能有机会加入“燕京学堂”计划。在随后的致辞中，鲍卡斯大使结合他本人在海外学习的经历，介绍了参与国际交流对他看待世界的积极影响。他表示，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处理地区问题需要与世界的合作，尤其需要年轻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沟通。

米歇尔围绕“海外学习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愿景”发表了演讲。她指出，开展海外学习和跨文化交流对于国家间的合作与沟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间的联系不仅仅依靠外交活动，民间的交流，

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交流，也是国家间互信友好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以曾在北京大学访学的学者阿比盖尔·科普林（Abigail Coplin），以及曾获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交流的北大教授牛可为例，指出跨文化的学习与交流，不仅使学术的发展受益，更将建立起中美学人之间长久的友谊，“这些纽带能在未来数十年丰富你们的生活，也丰富我们的世界”。为此，她和奥巴马总统都全力

支持“十万强计划”的实施，并将继续增加前来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的数量和多样性。米歇尔表示，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正在创造更加便捷的人际互动关系，边界的跨越、纽带的联结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她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展现青春风采，因为“你们不仅在改变自己的人生，也在改变你们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人生。”



米歇尔发表演讲

演讲结束后，朱善璐向米歇尔赠送由北京大学专家学者编写，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华文明史》作纪念。随后，米歇尔来到斯坦福中心地下一层的视频会议室，与现场的10名北大学生、10名北大美国留学生及远在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20名美国学生，通过远程视频展开互动交流。学生们就各自参与海外学习的经历展开了气氛热烈的自由讨论，并围绕海外学习过程中面临的外语学习、政府及社会相关支持等话题各抒己见。米歇尔在听取讨论后表示，

由于出身工薪家庭，自己在求学的时代缺少赴海外学习的机会，她此行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创造机会，让更多不同阶层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参与到海外学习中来。

下午两点，米歇尔一行结束在北大的行程，转赴颐和园参访。

来源：北大新闻网

记者：靳戈 刘博宁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协议备忘录正式签署 北大赢得主办权

2014年3月26日上午，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2018）协议备忘录签字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协议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北京大学和中国哲学界成功赢得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主办权，大会的筹办工作也正式启动。协议签署后当天下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

主任朱善璐在博雅会议中心会见了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现任主席德莫特·莫兰教授、秘书长鲁卡·马里亚·斯卡兰提诺教授和前任会长威廉·迈克布雷德教授，表示北京大学将全力支持第二十四届哲学大会筹备工作。



朱善璐会见来宾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参加了协议备忘录签字仪式并致辞。在致辞中，王恩哥首先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表示热烈

欢迎，并与大家分享了留给他深刻印象的德国海德堡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的“哲学路”。他表示，北大的哲学学科

历史悠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相信通过世界哲学大会的筹备和举办，必将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北京大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哲学学科的发展，并和中国哲学界一起，与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共

同做好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相信通过世界哲学大会的筹备和举办，必将促进北大学科建设的国际化。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网教之声

互联网思维与教培行业：规则的力量

2014年又是教育培训行业风起云涌的一年。好未来强势推出ISC3.0系统，学大郑重发布“e学大”辅导系统，新东方也公布了其互动学习平台。互联网四巨头3BAT也摩拳擦掌纷纷做好在教培行业的布局。

当然，最吸引眼球的还是欢聚时代高调插入教育培训行业，建立100.com，开启线上免费学习的时代。如果说2013年是在线教育的元年，那么2014年就是在线教育实践突飞猛进的一年。

笔者有幸加入了2013年在线教育概念的讨论之中，在去年2月发布的教培行业系列文章第八篇详细阐释了在线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路径。这篇文章被誉为系统化讨论在线教育的开山之作，文中提到在线教育需要解决“强制力”和“自激励”两大问题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文中提到的“互动式学习”和“游戏化学习”成为了激烈讨论的中心，并在往后的在线教育实践中被积极运用起来。

时至今日，一年已经过去，在线教育的凌厉攻势让所有从事教培业的人们既感到战栗，又感到惊喜。持负面态度的人担心在线教育颠覆整个教育培训行业，持正面态度的人在思考如何利用好互联网技术将教培行业发展得更好。笔者经过了一年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在原来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互联网思维的本质以及与教培行业的影响，希望能对沉浸于迷茫和困惑中的读者一些帮助。



过去的两年时间，“互联网思维”一词成为行业变革中最热门的词汇。余额宝点燃传统银行业与互联网金融新秀的战火，轻而易举地攻城略地，再度引发人们对互联网行业颠覆传统行业的无限遐想。一时间“互联网思维”成为

了包治百病的灵药，似乎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沾上了它就能立刻起死回生火热起来。

但互联网思维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是互联网大佬们给出的解答也是语焉不详。有人说互联网思维是自由平等民主，有人说互联网思维是以人为本注重体验，有人说互联网思维是大流量快迭代，还有人说互联网思维就是免费主义。文中的插图几乎囊括了大家对于互联网思维的所有看法。然而这些看法都没有揭示出互联网思维的本质。

人们惯常以互联网界的成功案例做分析来获取对于互联网思维的认知，这更有些像“盲人摸象”，有人摸到象腿，就说大象像圆柱，有人摸到象身，就说大象像厚墙，还有人摸到象耳，就说大象像团扇。正因为大家看到的都只是表象，所以才造就了互联网思维“一提就火，一用就死”的现状。大量打着互联网思维旗号的公司前赴后继，迅速地崛起又迅速地垮塌。为什么看起来是灵丹妙药的互联网思维，真正用的时候就不灵了呢？原因就是大多数人没有真正看清互联网思维的本质。

要了解互联网思维的本质，你首先得清楚互联网究竟能干什么。

互联网无法产生真实的货物，它只能作用于“数字化信息”。互联网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存储信息和处理信息。由于互联网通过光纤技术和无线技术跨越地域限制把全世界人群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它极大的减小了时间成本、空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从物理概念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其实抹消了时间 T ，位移 X ，力 F 这三个牛顿力学世界中最基本的物理量，解构了充满物理法则的现实空间，去掉了一切的物理成本，重建了一个没有任何障碍信息可自由流动、变化的虚拟空间。

我们甚至可以用近代物理进一步审视互联网的世界：信号传递速度最高不超过相对论的光速，信息存储密度和信息流量速度受限与量子理论的测不准效应。这是一个只用考虑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世界，与我们所生存的低速宏观世界比起来，成本可以完全忽略不计。所以互联网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解构了所有物理法则，使得超低成本超高体验成为了可能。

我们经常说线下的传统公司没有互联网基因，其实指的就是线下的公司往往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最终带来边际零成本的这一结论，所以传统线下公司不愿意在互联网硬件软件上进行充分的初



始投资保证构建的互联网空间物理成本消除的彻底性。如果互联网世界的物理成本消除不彻底（例如存储容量不够大、网速不够快、界面不够简洁、算法不够优化），那么客户的体验感必然受到影响，自然竞争不过雄心壮志敢于投入的互联网公司。

那么是否建立这样一个几乎零成本的虚拟世界就代表着运用了互联网思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认为互联网只是低成本，打着免费或低价旗号的公司大多数都死得很惨。一批又一批团购网站的倒下就是最有力的佐证。良好用户体验的前提是消除一切物理规则的成本，但并不代表消除一切规则成本就能带来最好的体验。

笔者在最近做过一次调查，在同时使用微信和微博的人群中，询问使用微博的时间多还是使用微信的时间多。超过80%的被调查者表示使用微信的多。这个结果似乎有些反直觉，因为用过这两个产品的人都知道，微信拥有更严格的规则和更苛刻的信息流动机制，然而微博却是一个更自由更公开，规则更少信息流动成本更低的产品。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微博信息流动的过于自由，导致大量的无效信息充斥在整个微博世界。如果你接收到的都是无效信息，那

么成本再低你也不可能长期高频次地使用。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没有规则的世界虽然没有了成本，却成了无效的世界，体验感反而变差。所以适当的规则可以进行信息地筛选，使得信息更加有效，最终带来用户的使用率提升和黏性加强。回顾互联网世界的成功案例就可知，真正的互联网思维并不是一味地抹消成本，而是在去掉现实世界物理规则后重建了虚拟世界信息规则，在新规则下规定信息的流动并最终引导用户完成目标行为。不过，规则一般只对特定的环境产生效用。如果出现了高热度的公众新闻事件，那么在那段时期微博的使用率将高于微信的使用率，因为此时微博的自由流动性和搜索功能将更有利于用户收集到更广泛的有效信息。

规则除了能带来有效以外，还能产生货币化价值。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有用的物品不一定有货币化价值，只有稀缺的物品才有货币化价值。我们身边的空气和阳光对于我们的生存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无成本地自由获得，所以它们没有货币化的价值，没有任何人会去购买它们。现实世界的物品价值是由物理法则所限定的稀缺性导致的，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

物理法则已经不复存在，如果没有其他法则进行限定的话，所有信息都是非稀缺品，产生不了任何的货币化价值，自然不会有任何一家盈利机构会去投资这样的世界。

规则导致稀缺进一步产生货币化价值在互联网中的最典型的实例就是比特币。比特币通过相当严格和负责的全局算法在每一个节点产生，而且需要特定的“挖矿机”消耗能量地计算来完成的。直观上看这是违背互联网的自由无成本的初衷的，比特币只是一组信息代码，互联网产生它原本不需要任何成本，然而强行的规则使得产生比特币必须有成本，而且产生的数量越来越少，这样的规则看起来很荒谬。但正是这样荒谬的规则使得比特币产生了稀缺性，才有了货币功能的可能。

不过，笔者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认可比特币的未来，只是为了论证规则带来价值这一论点。其他的案例也很多，绝大多数的网络社区都会按特定的规则对信息流动产生限制，使得更好更优的服务产生了价值，并让用户使用现实货币进行购买或者激励用户完成特定的行为。规则的这个作用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可以盈利的理论依据。

规则还有第三个作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何淘宝天猫的购物狂欢节规定在每年的11月11日。其实具体在哪一天其实不重要，关键在于每年都是同一天。直观上看，这又是违背互联网的自由精神的。如果追求互联网自由主义，那么打折扣的日子应该自由地选择，今年3月3，明年6月6，后年9月9。但事实的结果却是，即使是如此自由的互联网世界，网购狂欢节的日子也是按规则固定下来的。

互联网最终连接的是现实世界的人群，我们说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能最广泛地集合人群完成现实世界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例如维基百科，让全世界的人都去参与编写和修改，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超越大英百科全书近300年的工作量。但试想一下，如果互联网世界真的只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世界，这可能完成么？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朝着不同的方向行事，在一个绝对自由的世界里，所有人做的事的总和一定会相互抵消而归于零。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规则来形成做事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引发所有人共同行事的节奏，最终形成共振，产生巨大的能量。所以，固定日期的网购狂欢节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适应和接受这样的一种节奏，从而

在规则下的这一天产生极高的关注度与交易量。

维基百科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添加修改词条的规则，还有对于贡献量大的用户荣誉奖励的规则，这些规则使得所有参与维基百科编写的个体按照共同的规律和节奏进行贡献，最终使得他们所有人的行为都符合维基百科设计者的初衷。规律和节奏的重要性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都诞生在温带地区而不是资源更充沛的热带地区。其实道理和互联网规则一样，由于温带有明显的一年四季变化，形成了人类社会共有劳动作息规律，集合了强大的共振力量。同时明显的四季节奏也驱使古人研究相关规律（如星相学），使得文明产生雏形。

通过上面三段的论述，我们明白了规则对于互联网世界的重要性。综上所述，互联网世界信息规则的作用就是通过设定符合人性本质的规则，使目标群体产生黏性、获得激励、形成共振，最终实现预期的目标行为。永远不要忘记实现用户目标行为是规则的最根本目的。你的用户目标行为可以是“更多的购买”，“更积极的口碑宣传”，“更高频次的使用”，“更自发的工作参与”。无论哪一种目标行为都是在适当的规则

下引发的。由于互联网连接的人数众多，一旦目标行为成功引发，必然带来传统线下手段无可比拟的效果。

至此，笔者可以给出互联网思维的真正定义：利用互联网技术消除物理障碍、重建信息规则、引导目标行为的思维方式就是真正的互联网思维。在这当中，消除物理障碍需要充分掌握信息技术并敢于对互联网软硬件进行投资，这是互联网从业人士擅长的；制定用户的目标行为需要对相关行业特点非常熟悉并能随时监控用户行为的有效性，这是线下行业专业人士有优势的。在我第八篇文章曾经论述因为互联网行业的人不懂教育培训，教育培训行业的人不懂互联网导致在线教育进展缓慢。然而过去的一年中业界涌现出不少既懂互联网又懂教育培训的人才，可是在在线教育依然是场面火爆实质进展不大。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做好消除物理障碍和引导目标行为的工作，却忽视难度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重建信息规则的工作。

规则的制定既不是靠互联网技术的先进，也不是靠对线下行业的熟悉，而是要靠对人性的把握。规则的目的是引导行为，而由规则到行为经历了受众群体的反应过程，如果没有对受众的心理有充分的了解，则受众群体的行为有可

能失控，也有可能偏离预定的目标行为。说规则的制定是难度最大，是因为人的心理活动往往是顺直觉的，而人的行为活动往往是反直觉的，而规则要在这样一个顺直觉的心理和反直觉的行为之间搭建起一座连接的桥梁。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有趣的现象。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大街非常干净，但几乎看不见垃圾桶。这非常的奇怪，因为顺直觉思考，要想大街干净应该多设垃圾桶，这样才能鼓励人们把垃圾都扔在垃圾桶里。但事实上，有垃圾桶的地方往往是最脏的地方，因为人们只要看见了垃圾桶就会心安理得地扔垃圾。而在日本，正是因为大街上没

有垃圾，逼迫所有人都把垃圾带回家，反而使得大街变得更干净。微信也是一个典型的反直觉设定规则的案例。微信的转发、好友的建立都是非常严格和不便。但正是这种严格和不便才使得每一次转发和每一个好友建立都是深思熟虑的，使得微信虚拟空间的信息比微博更纯净一些，阅读量反而上升。

那么我们需要如何根据人性来制定规则？教育培训行业又有哪些目标行为需要我们去引导？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系列文章。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给出解答。

来源：多知网

作者：教育培训行业运营者和观察者，

小狼（雪球网 ID）

北京大学：以 MOOC 建设引领国内高等教育改革

2013 年，在北京大学的大事记中，MOOC 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3 月，北大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启动“北大网络开放课程”建设项目，确立了 5 年内开设 100 门的目标；5 月，宣布与 edX 签约，拓展在线教育模式；9 月，与 coursera 签署协议，进一步寻求并尝试多样化的 MOOC 平台；9 月—10 月间，11 门课程正式上线，吸引了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8 万人选学。

2014 年 2 月—3 月，第二批 MOOC 课程上线，其中，《生物信息学》将提供两种完成证书，一种是普通证书，另一种是加身份认证的证书。

到 2014 年 3 月，北大在 edX、coursera 和学堂在线三个平台上已经推出 15 门课程，内容涉及世界文化地理、艺术、化学、计算机等多个方面。

在全国高校中，对 MOOC 进行如此紧锣密鼓的部署是很少见的。在接受本刊



记者专访时，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网络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组组长李晓明教授表示：“推进网络开放课程建设是北大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通过一年多的实践，可以说，我们现在已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在大学现实背景下开设MOOC的道路。”

四大技术成就 MOOC

记者：现在，从国外到国内高校，MOOC 形成了一股浪潮。事实上，利用互联网做教育已有多年了，为什么近年才开始爆发，而不是在 10 多年前？

李晓明：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MOOC 是从 20 世纪末开始孕育的，到 2012 年开始涌现一个浪潮，经历了从 OCW 到视频公开课再到 MOOC 的过程，其标志是一批名校开始加入，一批名教授开始授课。

而在开放的中国，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足迹：从 1998 年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到精品课、视频公开课、资源共享课，到 2013 年的 MOOC，其标志是若干高校宣布投入，一批课程开出，媒体高度关注。

之所以现在才出现 MOOC 浪潮，与技术的巨大变化有关。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高效释放已有优质教育资源巨大潜力的成熟度。可以说，正是由于网络基础设施、Web2.0、音视频技

术和云计算等四大技术的进步和成熟促成了今天的 MOOC。

记者：从以往的网络课程中其实也可以找到 MOOC 的痕迹，为什么 MOOC 却让广大学习者为之疯狂呢？

李晓明：亲身体验过 MOOC 的人，都会感到一种震撼。尽管其中所有的技术要点，比如视频、客观题、论坛、通告、UI、云计算、教学节奏、同学互评等等，都似乎在哪里见过或者听说过，或者如有的人所称“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当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力量。

这就使 MOOC 具有了无穷的魅力。其一，MOOC 的特点是名师、名校、免费。哈佛等世界名校包括北京大学的教师对此具有很高的热情。他们的追求是崇高的，他们免费在平台上开设课程，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将高深的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对学生而言，他们在网上就可以接触到平生难以见到的名师，而且是免费学习，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二，学习成为了很快乐的事情。为了更好地研究 MOOC，我一方面教课，一方面学习。我开设了《人群与网络》课程，也学习了四、五门国外课程。MOOC 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只是短视频，它至少包括三个部分：视频、作业练习

训练、论坛讨论。这三位一体的观念在以前的网络教学中是不太强调的，通常只是把课程素材放到网上就万事大吉了，而现在三者之间的结合非常紧密。

谈到网络教学，人们最容易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互动。我认为，互动的含义远不限于“面对面”。比如，提交作业后会马上知道对错；在论坛上提出一个问题，有人回答了就会收到一个邮件，老师能够及时了解作业是否提交与正确率等情况，这些都是互动。也就是说，MOOC 比以前的网络课程更适合学生学习。

我认为，MOOC 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让优质教育资源低成本地向社会开放。

北大 MOOC 是为探索全球高等教育走向

记者：北大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府，但仍然积极投入 MOOC 建设，其原因是什么呢？

李晓明：我们认为，MOOC 是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它将显著影响未来全球高等教育的格局，也将影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所以，北大建设 MOOC，不仅仅是为了北大的生存与发展，也是为了探索全球高等教育事业的走向。

而且，身在北大，我们常讲要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做突出的贡献。在教育领域，目前国家最重大的需求就是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MOOC 的出现恰好为我们做出这样的贡献带来了十分难得的机遇。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感受到的；这样的机遇，北大也不是总能遇到的，但我们已经抓住了。

经过过去一年的工作，北京大学已经处在一个开展相关前沿研究的有利地位。MOOC 教学的多方位亲身体验，以及丰富的学习行为大数据，为我们带来了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未来的教学活动，需要这样的研究支持；未来的教育事业，需要这样的研究支持；未来的人力资源市场，也将得益于这样的研究成果。

记者：北大启动 MOOC 项目已经一年多了。您认为，MOOC 能给校园教学带来哪些改变呢？

李晓明：北大的 MOOC 上线课程，很多都是本校学生当前学期要上的课程，这样的安排，是希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也是希望利用 MOOC 带来传统教学模式的改变。

通过一年来的实践，我相信，利用 MOOC 能大范围提高校园教学水平。这里的“水平”包括质量和效益两个方面。

传统上，学习活动是通过教室上课、实验室做实验，以及田野实习等多种形式完成的。至于各种形式的最优占比，则取决于教学内容和资源投入。而未来的学习活动将通过教室上课、实验室做实验、田野实习，以及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完成，各种形式的最优占比，也是取决于教学内容和资源投入。

令人兴奋的是，如今，在线学习能够在许多课程中高水平地发挥作用，并且可以通过“翻转课堂”等形式促进传统教室活动的改革，更好地利用师生面对面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有些课程的教学活动完全能够在线进行。

就北大教师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讲课能惠及更多的学子，不受教室大小和上课时间限制。而 MOOC 提供了低成本实现这种愿望的可能，这客观上就使得北京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大规模辐射社会成为可能。

记者：教育部领导在考察北大 MOOC 项目时曾提出，希望北大承担起引领国内教育技术改革的重任。那么，北大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呢？

李晓明：为推动全国高校 MOOC 的开展，北京大学的科研成果都无偿贡献给大家。我曾经在各地高校做过多次演讲，我在报告中说，已经与 coursera 和 edX

沟通，只要是北大认可的课程，它们就认可，如果哪所高校有积极性，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把课程放到国际平台上去，与国外的课程比肩。

此外，北京大学正在举办 MOOC 相关教育技术培训班，“实战”是这种培训的重要特色。3 月 21 日第一期已经开学，目标是 5 年培训 500 名教师，最终达到提升北大教师运用先进网络信息技术能力的目的。待我们进一步积累些经验后，也愿意在这方面帮助其他高校的教师。

首批结课报告为进一步探索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在您的微博上看到，Nature 近日发表一篇短文，称统计发现，学习 MOOC 的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北大 MOOC 的情况如何？

李晓明：对于 MOOC，我们是认真实践，认真研究，扎实推进的。对于已经结课的首批 11 门 MOOC，我们在 2014 年 1 月进行了《北大 MOOC 课程调查》，旨在收集学员的反馈信息，以便为今后改进课程做准备。

现在北大首批 MOOC 结课分析报告已经完成，认真读读这些报告，从中就能深切感受到广大青年学子对 MOOC 这种新生事物的支持和期盼。

以我所讲授的《人群与网络》课程为例，我们选取了 225 人的样本量。总体来看，男性选课比例高于女性，学员以全职工作者和在校本科生为主，分别占到 39.6% 和 29.8%。从整体学员的身份分布看，已参加工作的人数与在校学生人数大体持平。其中在校学生中，中学生占 0.9%，本科生占 29.8%，硕士生占 10.7%，博士生占 4.4%。

在已经获得的最高学位方面，数据显示较为集中在学士、高中和硕士阶段，合计占选课人数的 93.6%。其中学士占 40.4%，高中占 30.7%，硕士占 22.7%，而初中及初中以下和博士两项仅为 2.7% 和 3.6%。

在年龄分布上，以 18 岁-24 岁和 25 岁-34 岁为绝对主体，其中 18 岁-24 岁占 48%，25 岁-34 岁占 33.8%，合计 81.8%。

在地区分布上，学员以汉语地区为主体，中国大陆占 92%，港澳台地区占 3.6%，合计 95.6%。在这之中，又以北京、上海、广州、台北等城市的学员和用户居多。少数海外学员也参与了进来，从数据上看，东南亚地区的学员占总数的 1.3%，欧美为 3.6%，其余为 1.8%。

记者：学员选择 MOOC 课程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李晓明：在我们的调查中，“出于兴趣、好奇或感到有趣”的占 92.9%，为了感受北大课程的占 55.1%，想要挑战自己的占 64.9%。

总体来看，学员多是出于兴趣爱好和对课程知识的内在需求，而较少以实际的外在目标比如找工作、考研为主要动机。学员往往乐于选择选题较为新颖、趣味性较高或与自己专业或自己学习经历较为相关的课程，名校、名师及最终的学习证书对用户在选择中有一定的影响。

记者：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他们对于这一学习方式满意吗？

李晓明：绝大多数学员对《人群与网络》的教学设计具有较高的满意度，普遍认为教学视频能够增进对教学内容的了解，对课程的难度、学习进度、习题作业以及线上讨论活动等方面的设计也持肯定态度。

就学习体验而言，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 8 成的学员认为，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学到了自己想学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认为课程达到了预设的教学目标。72.5% 的学员表示将把这门课程推荐给同学和朋友，56% 的学员表示会继续选修授课教师的其他课程。

记者：学员们对这门课程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李晓明：他们提出了非常多非常好的建议，我们整理出了 154 条，涉及课程管理、教学内容、视频设计、配套资源、课程互动等多个方面。这些建议是教师和教学设计者调整和改进将来 MOOC 教学的重要依据。

绝大多数学员提出了实现分层化教学的希望，即根据不同学员的年龄、职业、学历、专业知识背景等，来设置不同的难度要求和进度安排。我们认为，分层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是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要求，这一过程需要教师、课程团队包括平台技术团队付出更大更多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由点及面。

还有的建议提到应组织一些实际的线下交流活动，通过线下的沟通带动线上学习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如一位学员所言：“最好能像豆瓣那样组成话题小组，或者按区域进行课后实践活动。虽然这样难度确实很大，但是对于课程的影响力将会增加很多。”

总体来看，这些建议都是围绕“学员”这一主体进行的，而这些学员绝大部分是出于对知识的兴趣和追求，而不是为了短期的利益目标。这就要求我们，

面对这样广大的渴求知识的人群，需要尽最大的努力促使便捷、持久、高效的学习的实现。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和课程开发团队要做的很关键一点，就是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感到“满足”和“自我实现”。只有不断让学员体会到自己时时刻刻的进步，让学员体会到有困难时能得到个性化的帮助，才能真正产生学习的效益，而这也是北大 MOOC 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记者：在这个调查中，学员绝大多数是有学历的，而且又以北京、上海、广州、台北等城市的学员居多，那么，怎样实现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呢？

李晓明：我认为，要做好一件事情总要有个开始，总要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大城市的有知识的人群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对网络很熟悉，在他们的带领下，我相信 MOOC 这股学习浪潮将向西部及不发达地区蔓延，并惠及那里的莘莘学子。所以，建设 MOOC，保持开放的安排和态度非常重要，我们在这里高举高打，不懈推进，逐渐就会实现我们的初衷。

记者：您刚才提到，分层化教学和个性化教学是教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要求。我们知道，现在学习北大 MOOC 课程

的学员有 10 多万人，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呢？

李晓明：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前面也已提到，教师团队一定要努力，但面对庞大的人群，在学生差异化巨大的情况下，完全靠授课方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更多的要靠学员自我调节来找到因材施教的感觉。

比如，在学习时间、学习进度上，他要按自身情况掌握。他可以积极参加论坛讨论，培养自我表达的能力。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兴趣选择课程，在 MOOC 平台上，同样一门课程有多种，学生完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版本。好在这一切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大部分学员都是自愿来寻求知识的，因此，通过自我调节，因材施教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大学尚处于“看”的阶段

记者：虽然现在 MOOC 很热，但一些人也有疑虑，MOOC 会不会像一阵风一样刮过去？

李晓明：我对 MOOC 是充满期待的。MOOC 要成功，就不能只是演示，不能仅是示范，不能只是橱窗。那些我们已经见得很多了，不需要再来一次。如果还只是那些，就证明其仍没有融入主流，也就表明 MOOC 还不是可持续的。

那么，MOOC 怎样才能走向成功呢？我认为，关键是要从“外挂式”的网络辅助教学，变成“内嵌式”的教学新方法。即作为教师，可以自由选择上课的形式。他可以选择传统方式，也可以选择 MOOC 或者是某种混合教学方式。而且跟传统教学一样，教务处都要将其算做教师的工作量。同时，对学习者来说，他能够在网上找到应有尽有的 MOOC 课程，就好像我们在 Amazon 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书一样。这就是 MOOC 成功的标志。

记者：有些问题一直有争论，比如将来有些教师会失业，一些大学会倒闭。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晓明：就教师而言，这取决于各个学校的办学思路和管理。如果某地的一所大学决定自己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其他大学的优秀 MOOC，并且给算学分，那么，这所大学同一门课程的教师可能就需要转变角色，不需要再像从前那样讲课了，而是做相应讨论课的主持人。不是我不愿意讲“失业”这两个字，而是我的确认为在真正 MOOC 畅行的时代，从事教育工作的机会会更多。问题是，我们都应愿意改变自己。

就大学而言，如果 MOOC 将来能够发展到提供学历学位的地步，对有些大学

显然会有冲击。会不会呢？我认为很有可能，一些 MOOC 的质量真的很好。例如我这学期学的一门康奈尔大学的课，一共 10 周，已经到了第 7 周，视频看下来，作业完成，你能感到系统地学了一套东西。如果这种水平的课有机组成 30-40 门，对一个年轻人素养的形成、心智的提升而言，是完全值一个本科学位的。

记者：您经常到外地讲学，您认为中国的大学 MOOC 现在处于怎样的阶段？

李晓明：处于“看”的阶段。在一个讲座上，我曾经说，听说过 MOOC 这个词的举手，有一大半人举手。我又说，注册过一门课、学过一个星期的举手，马上没几个人了。我接着说，拿过一个证书的举手，那就基本没有了。

记者：您对中国的大学有什么建议吗？

李晓明：现在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问题是要做起来，而不能总是开会讨论，总是听别人讲。第一，可以在平台上选课，只有亲身体验一下，才能知道 MOOC 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能知道 MOOC 的魅力在哪里。第二，要把自己的课程做成 MOOC。在各地讲学时，我一直在呼吁，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的课好，就要尽快把它做成 MOOC，我帮你们放到国际平

台上去。可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像北大清华这样真正做起来的高校并没有几所。

我们中国的大学一定要认真面对 MOOC 浪潮，因为这是一场新的竞争。随着 MOOC 的发展，可以明确预测的是，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将会形成一个繁荣的课程市场。不同的人分别讲同一门课的情况会很普遍，比如，现在 Coursera 上约有几百门活跃的课程，其中与社会网络分析有关的就有 4 门。

可以说，MOOC 将成为一所大学的名片之一。未来，哪个学校的活跃 MOOC 多，这个学校的教育就会有地位；哪个国家的活跃 MOOC 多，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就会在全球有影响。

我们的大学一定要有自信。国外大学现在提供出来的课程也并不是都那么好，我们许多教师讲的课并不差。我们有那么多的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很好的课程，为什么不赶紧做成 MOOC，放到国际平台上参与这场竞争呢？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难得的磨练和改进我们自己、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过程。

来源：《中国远程教育》2014 年第 4 期

记者 刘增辉

北大人物

经邦济世 诗化人生——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教授(下)



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

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



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厉以宁教授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厉以宁教授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

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教授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教授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其中以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最为系统和深入。

厉以宁教授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



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

在厉以宁教授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教授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

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教授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



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教授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厉以宁教授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

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

诗词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众的印象中，厉以宁是一位严谨、睿智且有独到见地的经济学家，其实伴随他人生历程的不仅仅有经济思想，更有着充满激情与哲理的诗意，两者相互交融，构成他独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厉以宁诗词讲座的吸引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经济学讲座。

北大校园的女教师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每每钦羨不已，都说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尽在于她丈夫有名气，而在于大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在厉以宁 70 岁生日这一天，与他相濡以沫 42 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终陪伴在夫君身边，她也是厉以宁多首诗词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鬓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然而，当一位学生朗诵厉以宁写于 1971 年的《鹧鸪天》时，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这首词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



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厉以宁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一纸家书两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邻家夫妇团圆夜，正是门前盼信时……情脉脉，意丝丝，试将心事付新词，几回搁笔难成曲，纵使曲成只自知。”诗词，于他既是历史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无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在厉以宁的笔下都是含蓄蕴藉，不失骚人之旨。诗的语言清新、典雅，传统笔墨与时代气息结合得那么自然和谐，新而不俗，陈而不迂。这是他诗词的独特风格，其实这也是他为人、治学的风格。眼下名人诗词可谓多矣，但是像厉以宁这样的功底、意蕴，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不多见，何况对厉以宁来说，诗词只是他业余的一大“爱好”。他的词多于诗，这也许是词的长短短的形式便于表达无穷变幻的思绪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选择变换的余地。

作诗不是诗人的专利；读过厉以宁的诗词，甚至觉得非专业诗人往往能生产出好诗，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对诗词的兴趣，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20世纪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扬州震旦中学，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许多优秀人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擅长诗词，在他们的诱导和影响下，很早就开始学写诗词，后来成为终身爱好。”厉以宁17岁时填的第一首词《相见欢·仪征新城途中》，当时在南京读高中的他春假期间回家乡仪征途中作的其诗句美妙委婉，读来使人如临其境：“桨声篙影波纹，石桥墩，蚕豆花开一路水乡春……”这第一首词严格按照上阕平、下阕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鲜动，用词浅易平实而又十分讲究。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学的国文老师，诗词格律是老师教的，而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能默写出几十种词牌的正谱。厉以宁认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做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从未消沉，他说这应该归功于诗词的涵养。由此他认为，现在中学生的“营养”过



于单一，文学知识太差，这对于一个人的全面成长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也许今天的厉以宁会是一位职业诗人。他后来开始了毕生从事的经济学研究，但吟诗赋词的兴趣却始终未减，这种爱好也的确给他多年沉闷而又艰辛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慰藉。厉以宁性格开朗、思维敏捷，他以睿智乐观的博大心胸接纳生活，无论处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总是泰然处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其不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诗词为伴。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作为积极主张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发展变化的观点也贯穿于他的诗词，而这些诗词也把他的才华和性情真实地展现给读者，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内心丰富的经济学名家。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君扬 碧荷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专访叶嘉莹



迦陵频迦传妙音，一生诗词叶先生。叶嘉莹，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后代，诗词大家顾随的学生。她一生爱诗词，醉心于传播诗学文化，年届九十仍不止步。近日，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作为中央电视台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华之光·讲堂》系列讲座类节目的首期主讲人，作客北大。《北大青年》记者有幸独家专访叶先生，走进她与诗词相伴的一生。

当记者随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静老师走进宾馆房间时，穿着浅紫色上衣的叶老，正坐在沙发椅上等待着我们。年届九十的老人，迈台阶已经需要人扶，但

看到我们进来，还是缓慢地微笑着站起了身。

面对这样的大师，又代表着北大多年来第一个有幸采访叶先生的校园媒体《北大青年》，我们难免紧张。然而叶先生和蔼的微笑和老花镜后温暖的目光，在宾馆柔和的橙色灯光下显得平易亲切。如果不是案头刚吃了一点的蛋糕和水果，记者几乎要忘记叶老刚刚在百年纪念讲堂结束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座，而且还没有吃晚饭。

白发先生，诗词女儿

叶嘉莹先生 1924 年生于北京，号迦陵，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该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曾



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桃李满天下。2013年，她当选“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委员会在颁奖辞中这样写道：“师承一代名家，海外别有建树。在世界文化大坐标下，定位中国传统诗学。她是白发的先生，诗词的女儿。”

叶先生家学渊源，她的祖先纳兰性德便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叶先生少女时代从师顾随，顾先生是王国维后古典诗词上少有的大家。少时的叶嘉莹早已显出词学天分，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她的学问愈发精进，师生相得，其乐融融。但这宁静的时光不久便在日军的隆隆大炮中粉碎。乱世中的求学生涯愈发艰难。在讲座上，叶嘉莹先生回忆起这段岁月，不由得慨叹到：“读书曾值乱离年。”其中滋味，只有叶先生自己明了。

然而这仅仅是她人生艰难的开始，往后的日子里，叶嘉莹先生经历了更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艰辛。丈夫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投入监狱，她抱着孩子投奔亲友，为了不打扰别人，总是夜深人静时才回屋，小心翼翼地在窄小的走道里

铺上一张凉席躺下，天明时又要马上卷起。

为了养家，她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三所学校教书挣钱，身体每况愈下。在叶先生的传记中，她的学生写道：“课程繁重，又染上了气喘。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气血精力已全部耗尽，每一呼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回家后，还要因没有做好家事怀着负疚的心情面对夫权的责怨。”

后来，她为生计所迫，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接下教本科生的工作。为了教授毫无中文背景的本科生，叶先生要用英语备课，每晚查生词查到凌晨两点，第二天又要强打精神去教书。当时她一家五口都已迁居加拿大，八十老父在堂，膝下两幼女待哺，丈夫工作一年即失业，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她的弱肩上，她无可选择在46岁时磕磕绊绊地重拾英文：“你想我们这么美好的诗词，把它变成英文，我怎么讲？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你翻成英文：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from afa，这是什么？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真的没有办法讲。”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叶老人生的底色多半是厚重的，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在她身上，却很难感受到岁月驳杂的光影。谈吐之间倾露的，反而是一种出人意料的孩子样的纯白。

谈到如何一点点熬过苦难，终至涅槃，她只是一语带过：“我总是退后的，总是逆来可以顺受，不争。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命运把我安排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但是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尽力做到最好。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解决，努力去做。”

怀着如此简单的想法，她一步步熬过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苦辛，也一点点铸就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成就。讲座中央视的主持人说，中国有将极有学问的女士称为先生的传统，当代能称先生的女性中，叶嘉莹先生应是第一。单论叶老在诗词上的成就，无论男女，都无疑是绝难找出人与之比肩。海外很多汉学家，都是她的弟子，国内一些知名诗词学者，也是她的高足。

可是说起成就，她的脸上还是一样淡淡的微笑：“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什么成就，我也不是什么大家，从来也没有远大的理想，我什么都不好，我只是喜欢古典诗词，我觉得诗词里面有很多

很美的东西，大家不知道很可惜，所以我就愿意给大家讲一讲。”

这一份纯净简单的诗词之爱烙印在叶老的灵魂深处：“……那是所私立女中，刚到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这里的女孩子可能只是拿份文凭做嫁妆的，可还是要讲啊，对不对得起学生我不管，我要对得起这些诗人、词人。”“反正我从事诗词的阅读研究讲授，我都觉得很快乐，因为我喜欢诗词么。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工作，也没有想到什么成就，要不然我早就应该退休了。”她笑出声来，“只要是讲诗词，我就是很高兴的。不管年龄大小、不管海外国内的同学，我讲诗词都很高兴。在加拿大教过幼稚园的小朋友，还是很高兴啊。”

她说着这样的话，语气都是轻快的。

很多真正成大学问者，心里都是空空的，没有雄心壮志，没有豪情万丈，只有很简单的一——“我只是喜欢”。也许只有这样坦白空灵的心，才能装下渊博如海的学问和冷暖无常的人世。求知若渴，虚怀若谷。

“词有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所蕴含的乃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之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丽。叶先生说“弱德”的“弱”不是“弱者”的“弱”，弱者只是趴在



那里挨打，是完全被动的。而她所欣赏的那种“弱”则是一种婉曲，在婉曲中不改变自己固有的本性。“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说着词，就好像在说老先生自己的一生。

所有的苦难与泪水，无尽的折磨与遗憾，对这个耄耋老人来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她从来只是她。也许并不仅仅是岁月惠赐的通透让她淡然，更多地，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传统，让她的生命从来都是如此强韧。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诗词，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读得很多。小时候读的第一本书《论语》对我影响很大，我始终认为《论语》是非常宝贵的，有很多道理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谈到《论语》，叶先生不自觉地轻轻拍了一下手，“比如说，小时候的自己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猛然一惊，就在想，‘道’是什么？后来抗战时期生活艰苦，做学生、做老师的时候，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可是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因为孔子说过：‘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

与？’一个人最重的是内心的品格、修养，而不在外表，外表的一切其实都不属于你。”

“听有的年轻女性说：‘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这注重的就是外在，而不是内心的持守。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所以一个读书人有志于学‘道’，是不会在乎这些外在的，如果学了道理却以不好的衣服事物为耻，那么这种人根本提不到话下，所以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话都对我影响很大，不管是贫穷、困苦、患难，我都觉得人内心有持守和追求是重要的，其他的都是外在，是不重要的。”

越大的成就往往意味着越简单的心灵，走得越远的传播者，越是以故土为骨血。

她有那么多苦难可以当做谈资，她有那么多成就足可以夸耀，可是在她自己眼里，这些都不算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苦难不过外在，坚守只因痴爱。所以这一生颠簸，却顺理成章。

诗词立身，笃志躬行

因为《中华之光·讲堂》是录播的节目，观众人数上有很大的限制，虽然领票的队伍排得很长，但是最终可以进入



百讲聆听叶老讲座的不过百名。即便如此，现场气氛始终颇为热烈，有笑声、掌声、古琴声，也有叶老和辅讲嘉宾汉学家王健先生用古法吟诵诗词的声音，我们想，辛劳了一天的老人居然还有这样的精力和热情，大抵也只是因为她那些纯粹而简单的诗词之爱。

节目结束时，已经忙碌了一天的叶老还是明确提出，在节目之外，希望和北大的同学们短暂交流。面对大家踊跃的提问，叶老一一进行了详尽的回答。讲座结束后，还有很多同学挤到叶老身边，一直从百讲多功能厅所在的二楼跟到叶老下楼上车。也是有感于同学们的极高热情，一贯对于接受采访颇为谨慎的叶老，在讲座结束后的深夜，不辞辛劳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这也是多年来叶先生在北大首次接受专访。

叶老每年固定往返于加拿大、中国，讲课的足迹踏遍五洲。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告诉我们，叶老现在还在带研究生、博士生，还在讲台上教书，周周有课。而且只要是大课，一定要站起来讲。对于一个只有半年就要迎来九十大寿的老人，对于一个在脱离旁人的搀扶已经不能迈台阶的老人，艰难处不言便明。她总说诗词是有生命的，于是她的生命就烙上了诗词的精魂，传承了诗

词的伟力，用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毅力，永不停息地向前。

采访过程中，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舫匆匆赶到宾馆。她在会议的半途从东四环赶来西四环，只为了见叶老一面，见过这一面还要立刻赶回去。她给叶老带来了人民日报刚出的报纸，通版的报纸上按年齿为序排布着中国学界各位大师的介绍，叶老名列其中。她一一为叶老介绍，叶老反应迅捷，应答如流。据她说，人民日报是绝少有通版的，等到叶老九十大寿前夕，还希望叶老拨冗接受她的专访。叶老说：“到明年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当然可以……还是太忙了。”

“为什么我愿意为中华古典诗词奉献终身？因为‘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中国古代的诗人们用生活去实践，用人生去表现，他们的精神与天地往来。我也要用生活去实践古典诗词，将诗之意境传之久远。”

《华严经》中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南怀瑾解经时解释道：“所有的佛经，乃至所有的宗教，看人生都是悲观的，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要求解脱。唯有《华严经》所讲的，是认为这个世界无所谓缺陷，即使是缺陷，也是美的。处处皆是佛，一切众生人人皆是



燕园网讯

现代远程教育校园文化讯息摘编

佛，是一真法界，万法自如，处处成佛，时时成道。”

隔着岁月烟河山川平仄去回望叶老这一生，不外如是。

文章来源：《北大青年》

记者：考古文博学院 13 级本科生刘婵，
中国语言文学系 12 级本科生吕安琪

■ 北大学者谈读书

书籍与修养

《周易》(大畜填象词)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修养。修养需要多识前言入选,理至明显。但一个人要多识前言往行,最要紧的事情便是读书,因为前言往行,我们只能在书籍里觉得。

后魏的道武帝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对曰:“莫若书籍。”这当然是因为书籍记载着前言往行,乃是过去人类智慧所积存的地方。

宋朝黄庭坚曾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从来讲书籍和修养的关系的,没有比黄氏这几句话更为亲切了。

十九世纪下半其,英国文学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亦以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应为修养所资的,差不多全在书籍里。

因为这些贤哲的启示,我自己喜欢藏书,也希望别人喜欢藏书。

当然,藏书并非即是读书,读书亦不一定要藏书。世间尽有许多藏书而不

读书的人,亦有许多能读书的人乃用借来的书读好的。

但最理想的读书环境莫如自己。自己的书,读起来要好些,这里读书的人都有同感的。除此以外,架上或桌上的书籍,有时可以使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主人成为一个有出自的读书者。世上有许多收藏古董的人。从欣赏艺术品或保存艺术品的布点讲,他们或许是一种有意思的人。但就普通情形讲,他们行为的动机,由于货利方面的多,由于文化方面的少。藏书家便不然。世上固然有富翁以收藏宋元版本或莎士比亚作品的初版为务而并没有丝毫学问上的意义的,但究竟是少数。

况且,我要自己收藏或劝人收藏的书,是现在最好的书,现在最可读的书,现在最有用的书。这种书籍,大部分都是现在代的著作,并不是可以当古董买卖的。从我们现在的观点,即就古人所作的书籍讲,亦不一定以古本为最好。譬如,《十三经注疏》,并不是宋元自反的为最好,而是现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阮该本的为最好,最有用,最便于读;

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是原来的四开本或两开本为最好，而是 Arden Edition，或 Alexander，或 Sisson 等人所校订的本子为最好最使用，亦最便宜。

本文所讲的藏书，大概是就已离学校的人讲的。但一个在中学或大学的学生，亦未尝不可作藏书的企图。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曾以家中给我的钱买到前四史，古经解汇函，小学汇函（尚是广东原版）等书，到了大学，买书的兴趣当然更大，范围亦更广。我知道现在学生经济情形或不很好，但现在便宜的好书亦有很多。中文的影印本，是大家所知道的；衡阳路一带的书铺，陈列着很多廉价的版本（如牛津大学出版部所印行的 World's Classics，美国出版的 Modern Library 等，亦很值得学子们注意。一个学生，能够省下一次或两次看

电影的费用，便可以买到一本印得很好的世界名著了，这岂不是一件极大的事！

我现在引十九世纪中英国大史学家麦考利 (Macaulay) 的两段话，作我这篇短文的结束：

“与其做一个国王而不知道爱好读书，我宁愿做一个穷人居于陋室而拥有极多我书籍。”

“书是我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有选择生活的自由，我就愿意埋身于一所你我所曾同参观过的大学图书馆中，并且不愿意有一时没有书籍在我面前。”（这是麦考利写给他妹妹信中的话。）

来源：《北大学者谈读书》

作者简介：毛子水（1893—1988），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天津《益世报》副刊主编。1949 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自由中国》、《新时代》杂志主编。有《毛子水文存》等。

读书与生活

到白沙来，原是应了朋友的约，来看看梅花的，听说有三百棵，很羡慕诸位的幸福。不料却有同学来找我演讲，我不免叹一口气，心想说书的命，到甚么地方也逃不脱。不过我实在没有甚么

可说，因为我只带来一个空空的脑袋，预备装满了好风景，好印象回去；却原来也要付代价。这年头，穷日子真难过。幸而听几位先生说，诸位很爱读书，我因此想到现在要讲的题目。诸位也许笑



我，“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想这样笑我是不应该的，因为读书也罢，生活也罢，我都外行得很。现在纠缠到一块来说，恐怕更说不好听了。

听一般人的说话，读书仿佛是怪令人头痛的事情。不是“一部念四史无从读起，”分量太多，就是天气不好，“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又凉来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这首好诗，别处的学生听说都是很心会的。说是进学堂读书来的，为甚么这样为难呢？我想，现在的教育制度要负一部分责任：拿死的知识填塞了之后，再拿考试来测量结果，不要几年，学生就变为完全被动的了，读书的兴趣也被消灭。我记得自己在学校读英文时，先生曾经用过几种英国文学名著作教本，结果我往往想到这些书的颜色和样式便觉得厌恶。我这样怀着偏见来厌恶的，有那位“写起文章来像天使”的高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以后我每看他的文章，特别看看他那聪明的高额头，便觉得怪对他不住。连对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我都表示过不敬，诸位就想一想这些教育家的本事！幸而我自己碰到一本《天方夜谭》，使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没有完全被闷死。

从此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在课堂上虽然不免常打盹，课外却往往懒得睡觉。我用不着再听先生三番五次的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或“书中自有颜如玉”。我知道他们只使我见到“颜如铁”，我倒不如闭眼念几声佛。我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怎样，不过我相信在塞与考两重夹板中间，总压不出很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要想培养读书的兴趣，非将态度根本改变了不可。读书不是要应付考试，不是要敷衍外来的要求，却是要满足内心的需要，充实自己的生活。换了话说，读书必须是自己的有机的一部分，必须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若是书和生活经验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书便有了味道，变为知己的朋友一样了。若是生活经验从读书扩大推广，充实的机会就无限的增多了。书将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根本改变，是常有的例子。反之，实际生活的经验越丰富，读书的欣赏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广，也就越能领略书中的真味。所以读书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两者并进，才可以达到佳境。光读书而无生活，只尝得到间接的经验，和吃嚼过的饭差不多；光生活而不读书，却势必空虚，狭小。

我现在来举几个小小的例子，说明我这一点点的意思。我说读书可以增加深生活的经验，因为名著是最好的感情和思想的结晶，我们可以从其中吸收无穷的，精神的养料。很平常的东西，经过名著的作者，特别是诗人，描写之后，便有了意味，在读者的心中形成了联想。这样的诗句便成了“Open, Sesame!”（《阿利巴巴与四十大盗》中开门的咒语）一样的咒语，可以替读者打开了珍贵的宝库。诸位知道，罗马有一位大诗人维吉尔（Vergil），他在中世纪被人认为魔术师，因为他的半行一行的诗，往往可以在读者心里唤起无穷的联想，仿佛是咒语一样。

最近翻译吉辛（George Gissing）的《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 croft），其中有一段将这个意思讲得最好。他引约翰生（Samuel Johnson）的话：在读过书和没有读过书的人之间，同死人与活人之间，有同样大的差别。接着他说蝙蝠和枭鸟，若不是因为入了诗人的世界，他也许看到它们，听到它们，只怀着厌恶或迷信。可是，

“Then nightly sings the staring owl,

To -whit!

To -who! --a merry note.”

（凝目的枭鸟夜夜歌唱着，

To -whit!

To -who——欢快的歌调。）

“On the bat's back I do fly After Summer merrily” （我在蝙蝠的背上飞来飞去，快快乐乐的追随夏季。）

这两种鸟便入了超凡的境界，变为富于诗的联想的了。可是对于不读诗的人，它们和麻雀有甚么不同呢？夜莺、云雀、布谷，也因为诗的联想，更被人珍视。这种微妙的经验，不读诗的人却无福领略。我因为韩愈的诗句——

“黄昏到寺蝙蝠飞，”

对于蝙蝠也颇怀好感，而且每见到它，往往想起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

仿佛见到了诗人辛弃疾独宿的凄凉情况。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过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其他如树木花草，本身固然

是美的，也因为诗的联想而更美。梅呀、柳呀、梧桐呀、芭蕉呀，在不读书的人的心目中，假如引起甚么情绪的话，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读书使我们的生活丰富。

吉辛又说到中夜的钟声使他惊醒，若不是为了莎士比亚的联想，他也许会诅咒它扰乱睡眠呢。读过张继的

“夜半钟声到客船，”

假如诸位中有人中夜被钟声惊醒，不会因此感到喜悦吗？

生活的方式和态度被读书所改变，是所以还要办教育的基本理由，恐怕诸位从教育家听的已多，见的已多，我用不着多说了。我只说一件小事。多年前我读到一篇论散步的文章，作者特夫莱严（G. M. Trevelyan）说他有两位大夫，一位是他的左腿，一位是他的右腿，在身心失调的时候，他总请他们医治，而且一治必好。那时我还在穷学生时代，而且颇有人担心我活不下去，所以常请这两位大夫侍候我，是最合理，也是最经济的事。决然下聘约。不像目前许多教授，只兼挂名的差事，他们倒是很热心服务的。几年后旧同学见到我，都惊讶我居然不但没有入墓，却比以前健康些了。这还是小益处。他们给了我更多

的精神上的快乐。我觉得我的整个的人生观，都差不多因为他们改变了。别的人听说都是用脑子思想的，我却用腿思想的时候也颇多。我向诸位保证，腿实在不像许多脑子那样空虚。假如我早几年读到这篇文章，我不知要多得多少益处；特别他论到青春苦恼期的一段，会给我最健全的启示。我先说到蝙蝠，诸位也许有讥笑我悬空的；这一回可腿踏实地了。

我说生活的经验也可以增加读书的理解和欣赏，让我也来举一点小小的例子。记得有一回，和在座的台静农先生谈到中国诗的意境，我说很欢喜柳永词中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问我，前一句“今宵酒醒何处，”如何？我摇摇头，因为我不善喝酒。他却觉得酒醒后那境界更好。这有点不好商量。不过他继续说，有一次回故乡的途中，却亲身经历过这境界。我只有甘拜下风，承认他的欣赏更真切。在我，“杨柳岸”和“晓风残月”从没有合成过一张和谐的图画。

我在北平，教学生读过一点诗，有一位坦然承认念不出甚么味道。多半是情诗，他正在厌恶女性，难怪的。暑假后，他见我第一句话便说他喜欢那些诗

了。我笑了笑，知道他不是在厌恶中过日子了。

对于名著的欣赏，有许多地方很受自己的经验限制，所以脍炙人口的名著，有时读不出甚么好，也不必扫兴的。怎样的名著也往往有不精彩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自己的了解力过差。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同样领略。有人说，一年读一次莎士比亚，每次都可以有新发现。真正的名著，大体都很耐咀嚼，咀嚼一回，总可以得到些真味。不要只相信别人的说法，虽然明达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的欣赏，可惜这样的批评并不多。我们和十个人相交，未必有两三位可以成为朋友；从书中所得的友谊温情，比例却比较高。有时我们自己的经验没有成熟，不能了解欣赏一部作品；有时同一作品，因为读的时间不同，给我们很不同的印象，可以证明自己的经验往往在读书上有绝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要想深入到书里去，非同时将生活经验尽力扩大不可。有批评家说，少年人读西万提斯（Cervantes）的《吉珂德先生》（Don Quixote）会发笑，中年人读了会思想，老年人读了却要哭，也就正是这个道理。

所以生活同读书是分不开来的。一方面不要作书呆子，将脑袋里装满着死书；一方面也不要空着脑袋过生活。读书应当是生活的一种享乐，不是令人头疼的工作。生活应当用书籍来陶冶，使它美化并充实。读书，我们可以接近古今中外的良师益友；生活，我们才可以接受他们给予的恩惠。这样将生活和读书熔为一炉，我想英国诗人勃莱克所说：

“……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一粒沙里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一个天国，）

这境界我们有时候可以领略到。

谢谢诸位的耐心，费不少时间来听这几句很平常的话。

一九四四年一月

作者：李霖野（1904~1997），安徽省霍丘县叶集人。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著有小说集《影》，散文集《给少男少女》，诗集《海河集》，杂文集《鲁迅精神》等。

来源：《北大学者谈读书》

好文共赏

费孝通的学术理想

费孝通先生与世长辞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特别是很多学术遗产。费老他的文字大多被收集在已出了 16 卷的《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版）中，这 16 卷的文字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留下了先生行行重行行的串串足迹。先生的思想和足迹，带着 20 世纪中国的众多经验和教训，走进了 21 世纪，它们在恬淡的语言中得到表述，其意义却非常沉重。

对于费先生的学术，大家知道得最多的，也许是他对乡土中国的结构与变迁的论述，他提出的乡土中国现代化的“内发理论”，及他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起到的举足轻重作用。在这三大方面，费老确有高度的学术建树，但他的成就不止于此。我认为他是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的著述对社会科学诸领域的“中国表述”，都有难得的启发，其论点应得到更广泛的延伸。

费先生之所以能成为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天分、他的历史机缘和他所受的完整学科

训练。我认为，这与他的学术理想关系更为密切。

2003 年 6-7 月，我们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到费先生家去请教，我提到他对学者自我定位的早期论述，也问及他的学术理想。费老微笑地提到了他的《中国士绅》（1951 年英文版），他说到，他来自一个绅士阶层，这个阶层到了近代需要适应新的时代，而向各种新职业讨取生活。费老的家族原来属于士绅，到了 20 世纪初，家族内部已出现各种人，他的长辈有的做生意，有的开工厂，有的做编辑，有的留学，与古代相对单纯的士绅阶层已产生差异。费老说，他正是在士绅的近代衍生史中成长起来的，而他最关心的现象之一，是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演变。我对费老有关士人和知识分子的论述很感兴趣，问他对此最近有什么进一步想法，他说：

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宽泛，涉及到我最近提出来的“文化自觉”。我的意思是想问，中国文化的几个基础在什么地方？有关这些，我大胆地说说，不一定清楚。

第一个基础，我觉得是家族，中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主的，这到现在还是没有变，家族的基础没有动，只是收紧了，差序格局的网络小了，其他东西嵌进去了，引起更多的变化，可是基本的变化还是在亲属制度范围内的。提“文化自觉”，实际是因为想到怎样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同人应该怎样相处这些问题。中国文化里边，有个特别发达的方面，就是人伦，这是人与人相处的规范。从孔子开始，人伦就成为我们一个规范，成为我们意识形态的思想中心，家族是一种表现。人伦与西方的上帝不同。最近我又看了一下（田汝康所著）《摆夷的摆》（即《芒市边民的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在给这本书写序时，我就讲了这个问题了。中国同西方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孔子讲的，我不知道人，怎么能知道鬼呢？中国人不把鬼当成一个 issue，不当成重要问题提出来，人对鬼敬而远之，这并不是要否定神、鬼的存在，我们也祭神，但是重心不放在人死之后。我们更注重活着的人的人伦。这个是我们东方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人伦超越了生死问题，超越了个人问题，它强调人与人如何相处、如何和谐相处这个主题。协调、位育、和谐、和为贵等，在政治方面也成为一

种意识形态，成为权力的问题。“敬皇帝而远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反对皇帝，是更注重人伦。

其次，让我讲得远一点。远古时代中国已有文字，而使用文字的人与不使用文字的人是有区别的。古代士同普通人之别是肯定的，但分别在什么地方？老百姓的社会交往是脱离历史、脱离文字的，而士则不同。文字是一种 communication 的途径，牵涉到意识形态的传递，本身就是“知之”、“由之”的问题，没有文字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有了文字就要考虑这些问题了。文字将两种人分开，与西方的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分不同，我们的社会区分是很实际的，是识字与不识字的实际问题，是文化层的问题。

我过去谈中国士绅问题，没有讲到这一点，没有讲得这么透。现在想来，文字牵涉到社会的基本分化。两种人各有文化，一种是口传的，如 taboo，盖房子不能如何如何，老百姓知道了就满足了。我的祖母，她就不讲事情为什么这么做而不那么做，她习惯地找口口相传的规矩去实践，谈不上变通，她认为男女不平等天经地义，从来不问为什么，她是文化的接受者，不做研究，只照着做。在我们的文化里，历史上出来一种



专门考虑问题的人，他们通过文字来记录和研究，引起了很多社会变化，造就了士大夫阶层。

我这一代属于士绅阶级，是有文字的阶级，是知识分子。士绅关注人同人的关系，关注人同人怎么相处，关注忠孝仁义。对于权力是忠，对于父母亲人是孝，对兄弟要公平、要照顾，讲仁义。归结为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强调内看、内观，不让别人做，不强加于人。人伦决定了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基本规律。

我提出“文化自觉”，是希望把中国基本的意识形态讲出来。但这一点我们这一代没有做到，希望你们这一代进一步做一点。

最近我还讲到扩大社会学的范围。人有感情，有看不到的东西，有一个内在的“我”。我可以自己明白自己，程度不深，但可以明白一点，明白自己做人，明白做什么样的人。这不同于 behaviorism 和 empiricism 的观点，西方研究社会，要求什么都要看得到、摸得到、闻得到，其实这些是表面现象，现象里边还有人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能完全知道，无非比人家知道得更深一点，更有层次一点。陈寅恪审查冯友兰的论文

的时候，说学历是要用同情的概念看人，设身处地的想，把自己倒回去。这样做不容易，但只有这样的，才能够读历史，才能深入地理解人的思想状况。人的思想，靠语言去解释不够的，靠语言不一定能看到“心”。关于这个，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说语言不够了，我能做到的是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感受到的语言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说的“言外之意”。我认为宋朝的朱熹已发展了这个领域，就是了解人的领域，他讲“心”，讲自己想的，想自己的。我可以理解他当时的感觉，这个东西里面有许多内容，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着大家认同。

我这代人对这有比较深的理解。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之别，古人叫君子和小人之别，指的就是所谓懂理和不懂理的差别，君子就是懂得道理的，能通道理的。

中国历史一贯有这个东西在里边。士绅这种阶层，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他靠别人养他，靠拥有自己不耕作的土地，实际他们是管思想的人，管社会的人，他们的作用是加强社会的团结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他们负责的任务，可以说是 integr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但西文的 integration 这个词又概括不了他们的任务的所有意思。应该说，他们的

一种重要功能，就是把人和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成为 the social 一词所意味的那个东西。中国出来一批士大夫，控制着这个事情，他们成为乡绅，在社会体系上，则成为绅权。绅权是政治体系的表现，以此为基础，出现中国的士大夫。（据 2003 年 6 月 30 日谈话录音整理）

1998 年北大百年校庆以后几年，费老反复谈到上面谈到的“文化自觉”，而从他的谈话看，“文化自觉”一说的提出，又与他对自己的文化定位有密切关系，它的意思无非是说，从士大夫的近代化而衍生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应当用文字，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所传承的文化，起一种高于“一般老百姓”的习俗的“社会结合作用”。

怎么理解这种“社会结合作用”？费老的学术理想，早在他 20 多岁时已明确表露。在早已于 1939 年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先生谈到我们“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耗任何财富和能量”。为了避免历史的再度失误，先生主张，“社会科学”应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乍听起来有些像是近代欧洲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东方回声，但实际读过先生在《皇权与绅权》中写的那几篇文章的人都不难知道，对

于社会科学的这一期待，恰恰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士人史的传统。先生对古代士人“为王者师”，“奉天以约制皇权”，对古代王权的“师儒”，都有高度向往，他对于唐之后士大夫道统之屈服，表露尖锐的批判。先生将社会科学和士人的“道统”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不同于自然知识和技术知识的“规范知识”，主张知识分子应承担起重新恢复自然知识、技术知识和规范知识之间关联的使命，以使中国摆脱“西洋的经济政治的……威权”，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合理的转型。

费老总说自己的最后几年愿意以“秀才的身份”来度过，而他最后保留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

记得几年前，我陪同一位英国教授拜访费先生，英国教授问先生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先生面带微笑地说：“我还是绅士，没变！”在一旁聆听的我，禁不住心中一阵酸痛：一个世纪老人，经历了多少风雨，却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认同。

4 月 24 日费老跟我们永别了。我特别悲痛。我与先生非亲非故。先生在我出生以前 20 多年，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大学期间，他那儿本陆续重印的旧作——《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皇

权与绅权》等，将我导进了学术圣殿。我有幸于先生留学之后半个世纪，去到同一所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同一门学科，并于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不久，回到他创办的学术机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在过去的 11 个年头里，先生的谈话和著述，都能给我启发和激励。我这代“海归”，不同于先生那代。在所有的不同里头，最突出的也许在于，我们这代容易误以为自己的一点点小小成绩已足以否定前代的成就。尽管

时代使然的性格不易消除，但先生的微笑使人反省。我反复阅读他的著述，到了 21 世纪开初这几年，我终于还是认定：这位慈祥老人积累的知识财富值得我们去继承，而这份财富分量如此沉重，以至于我们可能感到它是一种负担——其中有关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诠释，更是如此。

来源：王铭铭人文学网

作者：王铭铭，1962 年生，人类学家，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梁漱溟：做学问的八层境界



所谓学问，就是对问题说得出道理，有自己的想法。

想法似乎人人都是有的，但又等于没有。因为大多数人的头脑杂乱无章，

人云亦云，对于不同的观点意见，他都点头称是，等于没有想法。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学问，走上现在这条路，只是因为我喜欢提问题。大约从十四岁开始，总有问题占据在我的心里，从一个问题转入另一个问题，一直想如何解答，解答不完就欲罢不能，就一路走了下来。

提得出问题，然后想要解决它，这大概是做学问的起点吧。

以下分八层来说明我走的一条路：

第一层境界：形成主见

用心想一个问题，便会对这个问题有主见，形成自己的判断。

说是主见，称之为偏见亦可。我们的主见也许是很浅薄的，但即使浅薄，也终究是你自己的意见。

许多哲学家的哲学也很浅，就因为浅便行了，胡适之先生的哲学很浅，亦很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纵然不高深，却是心得，而亲切有味。所以说出来便能够动人，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自成一派，其他人不行，就是因为其他人连浅薄的哲学都没有。

第二层境界：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

有主见，才有你自己；有自己，才有旁人，才会发觉前后左右都是与我意见不同的人。

这时候，你感觉到种种冲突，种种矛盾，种种没有道理，又种种都是道理。于是就不得不第二步地用心思。

面对各种问题，你自己说不出道理，不甘心随便跟着人家说，也不敢轻易自信，这时你就走上求学问的正确道路了。

第三层境界：融汇贯通

从此以后，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你不会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道加以注意。

你看到与自己想法相同的，感到亲切；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同的，感到隔膜。有不同，就非求解决不可；有隔膜，就非求了解不可。于是，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慢慢融汇到你自己。

你最初的一点主见，成为以后大学问的萌芽。从这点萌芽，你才可以吸收养料，才可以向上生枝发叶，向下入土生根。待得上边枝叶扶疏，下边根深蒂固，学问便成了。

这是读书唯一正确的方法，不然读书也没用处。会读书的人说话时，说他

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不旁征博引；反之，引书越多的人越不会读书。

第四层境界：知不足

用心之后，就知道要虚心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

学问的进步，不单是见解有进步，还表现在你的心思头脑锻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锻炼得谦虚了。

心虚思密是求学的必要条件。

对于前人之学，总不要说自己都懂。因为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地先求了解它。

遇到不同的意见思想，我总疑心他比我高明，疑心他必有我所未及的见闻，不然，他何以不和我作同样判断呢？疑心他必有精思深悟过于我，不然，何以我所见如此而他所见如彼呢？

第五层境界：以简御繁

你见到的意见越多，专研得愈深，这时候零碎的知识，片段的见解都没有了；心里全是一贯的系统，整个的组织。如此，就可以算成功了。到了这时候，才能以简御繁，才可以学问多而不觉得多。

凡有系统的思想，在心里都很简单，仿佛只有一两句话。凡是大哲学家皆没有许多话说，总不过一两句。很复杂很

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

学问家如说肩背上负着多沉重的学问，那是不对的；如说当初觉得有什么，现在才晓得原来没有什么，那就对了。道理越看得明透，越觉得无甚话可说，还是一点不说的好。心里明白，口里讲不出来。

反过来说，学问浅的人说话愈多，思想不清楚的人名词越多。让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真要把他吓坏了！其实道理明透了，名词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

第六层境界：运用自如

如果外面或里面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学问必是没到家。如果学问已经通了，就没有问题。

真学问的人，学问可以完全归自己运用。假学问的人，学问在他的手里完全不会用。

第七层境界：一览众山小

学问里面的甘苦都尝过了，再看旁人的见解主张，其中得失长短都能够看出来。这个浅薄，那个到家，这个是什么分数，那个是什么程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自己从前也是这样，一切深浅精粗的层次都曾经过。



第八层境界：通透

思精理熟之后，心里就没有一点不透的了。

来源：文化传统

作者：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

“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史苑钩沉

北大怪人——辜鸿铭

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辜鸿铭，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

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

一八八〇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克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

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

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

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

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

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

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对国外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

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

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来源：现在故事网

《民国教授往事》

老北大课堂轶事录

在老北大，没有严格的课本，没有讲课深浅之规定，也没有课时进度之约

束，一切都由教师们根据情况而定。在这样的课堂上，教授们的智慧得到了充

分的施展；教授们的学风得到了充分的
表现；教授们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胡适先生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很具特点。

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道：“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俊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钱穆先生亦是学生们喜爱的教授，他讲课时从来都是座无虚席。

朱海涛先生在《北大与北大人》中写道：“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

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的长期吸引了人。”

鲁迅先生讲课虽不像演说家的演讲，但课堂上却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听课的不仅有国文系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他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引人入胜、娓娓动听，其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学问高深、但口才却差的四个老北大教授。

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将满腹学问都注入笔端了，而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走上讲台时常常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应算在此列。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just 却不善于言辞，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

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用手敲头深思。

顾颉刚先生，乃“疑古学”之大家，著有《古史辨》。先生学问渊博，擅写文章，但口才不佳，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吃吃一会儿，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的速度倒很快也很清楚。

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亦属不善讲课之列。学生们回忆：他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讲课有讲义，学生人手一册。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

不善讲课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实在难懂，讲不如不讲者。如陈介石先生，他在哲学系也是深受同学们尊重的。他讲课是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上课时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据说就是因其一口难懂的温州土话的缘故，促成了他的风格。

讲课中有的教授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也有的教授则更注重前人的错误。

陈垣教授便是这样。

在讲课时陈垣教授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代清楚，尤其注重前人的错误。有的同学回忆陈先生讲课时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教授中也有讲课喜欢标新立异者，有时异到胡说、离奇地步。林损先生便是代表之一。

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但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有时随口胡说。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时，竟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后来，他在学校整顿中被解聘。

还有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

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

据说他所著的《中国人的精神》曾被誉称为是“一部震炫欧洲思想界的巨著”。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即便是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并不是因其学问不精，而是因其教书不认真。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一学期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诗。

黄侃先生讲课的奇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田炯锦先生《北大六年琐记》这样写道：“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林纾平生任狭尚气，性情刚毅，除长于文学撰述之外，还精于武术，尤擅

舞剑，曾著笔记小说《技击述闻》，记载平日耳闻目睹的武林实事。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时，在课堂上经常向学生讲授武林故事。言谈之间，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让学生向往不已。

马寅初在北大上课，常对学生自称“兄弟我”。73岁那年，他讲话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兄弟今年七十三岁……”1951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寅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师生欢迎马寅初的大会上，马对北大师生说：“兄弟很荣幸来到北大做校长。兄弟要和大家提出三个挑战：第一，兄弟要学俄文。……第二，兄弟要骑马、爬山。……第三，兄弟冬天洗凉水澡。”

有一次李富春副总理来北大讲话，马寅初一会儿称他为李先生、李副总理，一会儿又冒出个“李副总统”。让很多学生想起了李宗仁。康生来校讲话，马一会儿称其为“康先生”“康生先生”，一会儿又称“康生同志”，到了最后，同志、先生称号全免，直呼其名：“现在请康生讲话！”

来源：《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肖东发 李云 沈弘主编

大美北大

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大学西校区。1986年破土奠基，1993年5月27日正式开馆。展厅面积约2000平方米，数万余件藏品多为中国考古学各时期的典型标本，如周口店北京猿人石器，新石器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商代甲骨文，山西曲村西周古墓葬出土的铜器、玉器等，还有陶器、钱币、封泥和民俗文物等。这些藏品始于本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

研究室，以后陆续汇集了北京大学博物馆和燕京大学史前博物馆的收藏。50年代后，陆续增添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系)从田野考古工作地点获得的教学标本，国内各文物、考古机构和博物馆调拨、赠送的物品，还有海内外文物收藏家捐赠的文物。

该馆馆舍为仿古建筑，与校内其它建筑风格一致，古朴典雅。其展览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考古教学标本系列展，按时代和考古学文化顺序陈列；另一部

分为北大考古学系近年来考古工作成果展，按工作地点集中陈列，已展出的有“金牛山人”、山东长岛北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山西曲沃曲村晋文化墓葬”、“河北磁县观台窑址”等。馆藏品共有2万余件，多为考古教学典型标本，如旧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地点出土石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典型器物，商代的甲骨文，西周古墓和遗址出土的铜器、玉器及陶瓷、钱币封泥和民俗文物等。置身其中，你会感到一种浓厚的学术气

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博物馆常年展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收藏的考古教学和科研标本，定期组织展示考古学重要工作成果的陈列，组织由其他博物馆和学术科研机构主办的交流展览。展览注重运用考古学出土资料，注重选取有准确出土地点的考古发掘品，根据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按时代、地域和考古学文化组织展品，特别展出了一些出于同一考古地层单位的器物群组。

校景亭



校景亭手绘图



据资料记载，校景亭原名翼然亭，是昔日名园鸣鹤园中一座最大的方亭。它早在乾隆初年就已存在了。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乾隆曾登上翼然亭观赏四周风光，并以“翼然亭”为题赋七律一首，赞赏这一带的风光之美。他在诗引中说“出西轩面横岭，亭中设便坐，近纳岚翠，远往野绿，仿佛香山来青（即来青轩）景色。”

诗文为：

峰有飞来亭岂无，天然距此不南图。
籍松为幄阴偏秀，依石成章兴迥殊。
茶鼎烟飞云半野，棋枰声杂瀑千珠。
寄言纵目搜吟客，莫认琅邪岩畔途。

后来，这一带成为蕙亲王绵愉的鸣鹤园。咸丰十年（1860），鸣鹤园毁于英

法联军之手，园中建筑多被损毁。而翼然亭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清末时，醇亲王奕譞曾做诗描述鸣鹤园景色凋零，但古亭幸存的荒芜景象。

诗云：

鹤去园存帐逝波，翼然亭畔访烟萝。
百年池馆繁华尽，匝径松阴雀噪多。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鸣鹤园遗址成为燕京大学校址的一部分。1926年，燕大迁来以后，对翼然亭进行了修整，并在亭内彩绘燕园校景十二幅，将燕园的代表景点荟萃于一亭之上。校景亭之名也因之而来。1984年，北京大学又对校景亭做了一番修葺。今日之校景亭，已经焕然一新，可谓北京大学校内最为雅致美丽的名亭。

学员心声

我的青春追梦故事

“梦想”是当今中国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一代又一代北大人永恒的关键词。一个国家要有梦想，一所大学要有梦想，一个人也要有梦想。“人的梦想各有不同，但绝无高低贵贱之分，每一颗有梦想的心都值得尊重。一个人人都可以拥有梦想的社会，一个无论你是谁背景都有机会实现梦想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这是北京大学王恩哥校长在本校 2013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表的以“青春之名，为梦想前行”为题里面的一段讲话。是的，每个人的梦想各不相同，伟大的中国梦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小梦想汇聚。也许，我的经历在青春追梦路上再平凡不过了，但我并没有停止奋斗的脚步。我叫张瑞圆，来自河南郑州，是一名在深十一年有余的外来务工人员。17 岁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特区。中专毕业的我曾先后在电子五金厂做过打磨工、铣床操作工；在健身房做过派单员、收银员、健身顾问；电子厂 SMT 操作技术员；食品厂打磨工、

装卸工、设备操作员；在公司门卫处做过保安；电子公司 OQC 检验员、品质主管；目前在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办事处任质量工程师一职，从事供应商品质管理工作。在此期间，我也曾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完成了为期 3 年的学习，并取得了深圳大学大专毕业证书。目前是 2012 圆梦计划北京大学的在读本科生。我想，我在深圳这么多年青春时期找寻追求梦想的路程里，除了得到了很多社会实际工作的经验和积累的人脉外，最大的收获是意识到持续学习不断汲取新知识的重要性，牢固树立了“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观念。我的这些经历和这种心得体会想必能引起很多圆梦学子的共鸣！他们与我有着相似的脚步，只是具体经历各有不同罢了。

2002 年 7 月 21 日的下午 16 时 30 分左右，当时还不满 18 岁的我跟一块来的同学们在随行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万丰工业区的一家电子厂门口。我仍清晰地记得，虽然每天晚上都要加班深夜，但最多的一



个月只有 971.63 元工资。那天我在取款机取完钱后，还兴奋地给一个同学打电话，跟他分享了一下心中的喜悦。当时的梦想是能够换一个不再打磨的工作或者每月能真正休息一天，还有每月的工资都能超过 1000 块！

后来受了工伤，辞工去市内找工作。由于学历和工作经验的限制，自身又没有什么专业技能，所以在人才大市场尝尽了招聘人员的冷眼和找工作带来的一系列困苦。这让我下定决心回到学校进行自我增值。我报名参加并通过了 07 年的广东成人高考，顺利被深圳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录取。犹记得参加“奋斗的青春最美丽——2013 年首期‘广东新生代产业工人圆梦计划’班委交流营”培训时，青职院谭洪文副院长说的话：学历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是不行的。它是个敲门砖，是个底线。同时，孙愈老师讲课时也说过：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2011 年我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不懈，顺利拿到了深大大专毕业证。自此，我便密集地接到了面试通知，得到了到各公司参加面试的机会。

遗憾的是，我没赶上团省委举办的

2011 年的圆梦计划。不过求知、求学欲望变得更强的我，在次年 5 月揣着一万二的全额学费去北大在深的教学中心，后经负责老师介绍报名了 2012 圆梦计划。经过刻苦复习，顺利通过入学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入围了团市委的资助名单。在校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平时在班级的班委工作较为出色，我获得了学校颁发的年度“优秀班干部”荣誉称号。随后，经班主任推荐担任年级团支部书记一职。我曾先后三次报考公务员，并在第三次最终资格条件审核完成后，凭借职位排名第十得到了积分入户的奖励；在此期间，我还结识到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虽然职业岗位不同但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脉圈。

引用孙愈老师上课时说的一句：“学无止境！无论你现在有多优秀，无论生活中有多大的困难，只要你心中存有梦想，总有一天梦想会实现，我们要做永不止步的追梦人！”

作者：北京大学圆梦计划学员 张瑞圆